乡村振兴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杨胜利，王伟荣，刘金盼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701000）

摘 要：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影响下，人口流向正呈现新的变动趋势。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0—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7 期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实证检验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强化；（2）乡村振兴战略对户籍所在地城镇化水平较高、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返乡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初期，其对短距离务工的农民工以及高年龄组农民工返乡产生的影响更为突出。随着时间不断推移，乡村振兴战略在促使长距离务工农民工和低年龄组农民工返乡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愈发显著；（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可以通过强化农民工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度，增强其主体意识，改善城乡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情况，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返乡；（4）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返乡后的就业类型选择和工作地点选择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为此，要完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效能，以县域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进一步推动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返乡农民工；城乡融合；返乡创业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5）04－0079－1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城市建设和工业化发展[1]。然而人口的乡－城单向流动，导致农村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劳动力流失的困境，与此同时“三农”问题领域矛盾日益凸显，给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农村生活条件和生产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大城市产业升级、人口调控等“推力”和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完善等“拉力”的综合作用下，农民工返乡趋势日益明显，返乡就业创业人数不断增加，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3]。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已经成为常态化，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 2022 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到 1220 万人，《“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5 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预计将超过 1500 万人[4]。

农民工返乡行为，不仅关系到农民工个人及家庭的未来发展，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既有利于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5]，促进农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6]，也有利于推动县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7]，是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8]。然而，农民工群体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户籍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业类型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其返乡意愿、返乡就业选择和返乡后就业创业服务需求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

收稿日期：2025－01－04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5.04.007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21RK001）

作者简介：杨胜利（1982—），男，河北肃宁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融合发展与人口流动，E-mail：82481675@qq.com

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了解其对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探讨返乡农民工就业类型、返乡地点等方面选择问题,对各地有针对性地采取各项举措吸引农民工返乡,提升引导、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政策效果,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影响农民工返乡的因素进行了诸多探讨。从分析维度来看,主要有"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制度、经济、文化"层面、"个体、家庭、社会"层面以及"个体、经济、社会融入"层面,强调个体[8]、家庭[14]、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形势[15]、国家和地区相关政策[16]、城乡互动[17]等方面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具体来看,流出地的社会资本越充足[15]、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越大[16]、农民工对政府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认可程度越高[18]、家庭责任感和家庭归属感越强烈[14]、家乡认同感越高[19],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更为强烈。同时,流入地的就业机会缺失[15,20]、同乡农民工的返乡行为[21]、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22]等因素均会对农民工返乡决策产生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在推拉理论下,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时间效应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如部分研究所得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效应"昙花一现"这一结论是否属实,抑或是该战略仍在持续释放政策效应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就返乡农民工群体差异而言,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返乡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比如返乡农民工家庭规模和抚养比、受教育程度、劳动年限、中老年的农民工占比[8,23-24]等。但对性别差异的分析结论尚未达成统一,有研究认为男性农民工返乡概率更高[23],另有研究则认为女性农民工基于抚育子女、赡养父母、管理家庭日常农业生产及生活等选择返乡的概率更高[24]。二是关注农民工返乡后的再就业类型[23],已有研究对农民工返乡后的就业类型选择倾向并未形成统一认识,部分研究认为返乡农民工仍会选择继续务农[25],且返乡农民工中存在一定的就业困难[26]。另一部分研究认为返乡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就业[17,27],仅少数返乡农民工会选择创业[17]。此外,有研究者认为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类型选择存在群体差异,不同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类型不同[2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的推进,相关群体的特征在一定时间内呈现出何种变化态势?其变动趋势是朝着更有利于乡村振兴的方向发展,还是致使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有所下降?这些问题亟待后续进一步跟进研究。

综上,已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以及可供借鉴的研究视角,但仍存在待深化研究之处:第一,已有研究虽均强调乡村振兴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大多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或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价乡村振兴指数,并以此探讨该指数与返乡的关系,这种研究范式导致结果不具体不科学,缺乏动态性,有必要进一步从量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效应角度展开分析;第二,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分析,较少聚焦于微观个体层面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政策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更缺乏对农民工返乡与否的群体特征异质性与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效应关系的演变研究;第三,现有相关研究多分析影响农民工返乡的地域性特征,聚焦于某一地区进行分析,缺乏区域间政策效果比较分析;第四,在政策效应和时效性范畴内对农民工返乡后行为分化的关注相对不足。政策效应范畴下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民工返乡的成效如何,变动趋势如何,对不同个体、家庭特征农民工的返乡决策会产生怎样的异质性影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类型、返乡地点的选择又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均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7期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量化乡村振兴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及动态变化趋势:一是从微观个体层面出发,探究个体特征、家庭因素变动在乡村振兴对农民工返乡影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二是从农民工户籍所在地城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务工距离、年龄差异等方面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影响的异质性及时间变动差异;三是探究乡村振兴战略促进

农民工返乡的作用机制,检验对政府工作认可度、城乡信息互通在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民工返乡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四是使用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进一步分析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下农民工返乡后的工作地点和就业类型分化特征。研究有助于充分掌握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机理,以更好地开发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资源,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举措。

二、研究假设

(一)乡村振兴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E·S·李认为人口迁移流、迁移量和逆迁移流是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推力-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工返乡决策是其在城乡之间推拉力的权衡下做出的选择[28]。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就业竞争压力大、职业发展受限、社会融入困难等“推力”因素,与乡村发展潜力巨大、亲情纽带紧密等“拉力”因素[18]共同影响着农民工的返乡决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动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为农民工返乡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具体来看:一是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发展农村产业,有利于增加农村地区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如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现代化农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8],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是政府政策、创业资金、技术指导等就业、创业支持举措力度不断加大,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技能培训与创业服务支持[16];三是乡村振兴战略注重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29];四是乡村振兴战略注重教育质量的提升,包括农村教育资源的优化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机会[30],这些因素成为吸引农民工返乡的拉力,同时这些因素不断朝着更高水平发展。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1:

H1: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拉动作用,并且这一拉动作用会随时间而变动。

(二)乡村振兴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作用机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使用规模显著提升,这反映了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的变动[31]。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推动了乡村数字化发展,促进了农村地区互联网平台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将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发展状况和返乡支持政策及时推送给外出务工者,进而使其更好地了解和适应乡村经济的发展机遇和市场需求[32]。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更多跨空间就业信息和技能培训机会,帮助其在返乡前做好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贮备,进一步拓宽跨空间就业选择范围,增强其返乡前的就业竞争力和对返乡就业的期望[31]。此外,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加快了农村电商等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就业的空间物理界限,实现了平台就业城乡一体化。农民工在综合比较流动过程中的流动成本、生活成本、生产成本后,返乡规模增大[8,33]。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2:

H2:乡村振兴战略可以通过强化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城乡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情况来促进农民工返乡。

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农村地区治理水平,乡村数字化建设促进了乡村数字政务、数字监管的发展[34],乡村治理方式向多元协同治理转变[35],提高了政府工作的公正性、透明度和高效性。政府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为,如就业服务、创业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6]。R. R. SELL 和 G. De Jong 的《论迁移决策的动机理论》认为预期是人口迁移的关键因素之一,回返迁移的原因就是对流出地重新充满期望。农民工通过了解国家和当地政府针对乡村振兴所出台的一系列支持举措[32],切实体会到乡村发展的动态变迁和积极成果,提高了其对政府工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增强了农民工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对农民工返乡行为产生积极作用。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3:

H3:乡村振兴战略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度来促进农民工返乡。

(三)乡村振兴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

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均对其返乡决策具有显著影响[8,15,23-24]。从地区维度来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不同地区的乡村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有所不同,部分地区的农村产业基础较好、就业创业资源更丰富,其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与城市地区的差距相对较小,而部分地区则相反。从农民工个体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技能和工作经验,相对更容易获得就业、创业机会,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返乡可能意味着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工作;务工距离较近的农民工,其与家庭的联系相对更为密切,也更容易获得家乡的资源和信息,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可以更快地融入家乡的发展之中,流动距离较长者则相反;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具有相对更高的就业技能和适应能力,更愿意尝试和接受新的就业创业机会,而年老的农民工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则较弱,在流入城市产业升级中面临难以适应问题。因此提出研究假设4:

H4: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群体异质性。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一)模型设定

通过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具体模型如(1)式:

$$Y_{i,t,j} = \lambda_0 + \lambda_1 treat_{ij} \times post_t + \gamma X_{i,t,j} + \mu_i + \eta_j + \varepsilon_{i,t,j} \quad (1)$$

式中 i、t、j 分别表示农民工个体、时间(年份)、所在地区;$Y_{i,t,j}$ 为被解释变量;$treat_{ij} \times post_t$ 为解释变量 DID_{it};$X_{i,t,j}$ 为本研究所选择的控制变量;μ_i 为个体固定效应,η_j 为地区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j}$ 为随机误差项。

在此基础上,参考黄炜等人[37]关于构建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做法,进一步构建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影响的动态双重差分模型,将2016年(政策实施前一期)作为基准年份,即非参数动态双重差分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2)式:

$$Y_{i,t,j} = \beta_0 + \sum_{t=2012}^{2014} \delta_t treat_{ij} \times I_{(year_t = t)} + \sum_{t=2018}^{2022} \theta_t treat_{ij} \times I_{(year_t = t)} + \beta_1 X_{i,j,t} + \mu_i + \eta_j + \varepsilon_{i,j,t} \quad (2)$$

式中 $I_{(yeart = t)}$ 为年份虚拟变量,表示在第 t 年时取值为1,否则为0;δ_t 表示2016年以前各年份被解释变量相对于基准年份(2016年)的差异;θ_t 表示2018年及之后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影响的动态效应变化。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共7期数据,并据此对农民工及返乡农民工进行筛选。其中农民工样本的选择,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农民工统计标准,即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者[5],并参考张在一[38]、张广胜[39]等人的研究,将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均纳入农民工样本筛选的范围。因此,将从事非农工作的农业户籍人口界定为农民工,其中本地农民工是指省内跨市务工和市内跨县务工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是指跨省务工的农民工,由于返乡农民工样本的筛选需要与后一期数据进行匹配,故在匹配后删除2010年的农民工样本,共筛选出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样本数据中年龄在18~65岁的41207个农民工个体作为研究样本。

(三)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1. 被解释变量

农民工是否返乡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在上述对农民工样本筛选的基础上,借鉴刘新民[40]等人

的做法,将本期农民工数据与后一期数据进行匹配,通过对比筛选出外出农民工中务工地点与居住地点为同一设区市、且务工地点与户籍所在地为同一设区市的农民工样本可定义为外出返乡农民工,同时,已有研究经常忽略市域内的返乡农民工,而这一部分农民工群体规模也非常可观[17],故此,将工作地点由设区市返回户籍所在区县者,也作为返乡农民工样本,赋值为 1,其它样本则赋值为 0。

2. 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战略交互项 $DID = treat_{ij} \times post_t$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中 $treat_{ij}$、$post_t$ 为处理组虚拟变量,$post_t$ 为时期虚拟变量,若所处年份在 2018 年及之后,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post_t = 1$,反之则为 $post_t = 0$,由于乡村振兴战略在所有地区同时推行,样本中所有个体均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本文中所有的 $treat_{ij} = 1$,即设定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前 DID = 0,实施之后 DID = 1。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涵盖了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分别为:年龄、性别、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务工距离、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净资产等。并根据农民工(返乡前)的务工地点与户籍所在地来划分务工距离,划分为市内县外、省内市外、省外三种类型。

4. 中介变量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选择城乡之间信息互联互通情况和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度作为本文的中介变量。互联网作为农民工了解家乡发展情况的重要信息渠道[32],故使用农民工互联网使用时长来衡量城乡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情况,农民工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度主要涉及对政府工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使用农民工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水平这一指标来衡量。各变量的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名称、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定义与赋值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返乡	是 = 1,否 = 0	41207	0.46	0.50	0	1
年龄	实际年龄(岁)	41207	36.83	11.31	18	65
性别	男性 = 1,女性 = 0	41207	0.60	0.49	0	1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人数(人)	41207	4.25	2.05	1	17
受教育程度	未受过教育 = 1,初中及以下 = 2,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 3,大专 = 4/大学本科及以上 = 5	41207	2.18	0.77	1	5
健康状况	不健康 = 1,一般 = 2,比较健康 = 3,很健康 = 4,非常健康 = 5	41207	3.36	1.14	1	5
务工距离	市内县外 = 1,省内市外 = 2,省外 = 3	41207	1.53	0.91	1	3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取对数	41207	9.37	1.84	0	15.55
家庭人均净资产	家庭人均净资产取对数	41207	8.85	4.52	-15.02	16.55
婚姻状况	未婚 = 1,在婚 = 2,同居 = 3,离婚 = 4,丧偶 = 5	41207	1.90	0.59	1	5
上网时长	每周上网时长(小时)	41207	5.90	9.92	0	168
政府评价	比之前更糟了 = 1,没有成绩 = 2,没有多大成绩 = 3,有一定成绩 = 4,有很大成绩 = 5	41207	3.36	1.10	1	5
健康变化	更差 = 1,没有变化 = 2,更好 = 3	41207	1.82	0.65	1	3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具体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回归分析均使用聚类到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由于乡村振兴战略交互项随时间变化,与时间固定效应存在共线性,因此,在基准回归分析中没有对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控制,而是选择控制了个体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续在稳健性检验中对时间效应的影响再次进行分析。

表2第(1)列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4)列为逐步加入个体、家庭以及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H1(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拉动作用)。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年龄、务工距离与农民工是否返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务工距离越远的农民工,其返乡概率相对越小;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家庭规模越大,其选择返乡的概率越大;婚姻状况对农民工是否返乡的影响则不显著。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列	(2)列	(3)列	(4)列
DID	0.199***(0.006)	0.755***(0.007)	0.211***(0.020)	0.759***(0.007)
年龄		-0.114***(0.002)		-0.115***(0.002)
性别		-0.102*(0.056)		-0.101*(0.056)
婚姻状况		-0.008(0.007)		-0.008(0.007)
受教育程度		0.011**(0.005)		0.011**(0.005)
健康状况		0.016***(0.002)		0.016***(0.002)
务工距离		-0.061***(0.003)		-0.061***(0.004)
家庭规模			0.011***(0.002)	0.003*(0.002)
家庭人均收入			-0.016***(0.002)	0.002(0.001)
家庭人均净资产			-0.007***(0.001)	0.003***(0.001)
常数项	0.368***(0.002)	4.406***(0.064)	0.524***(0.018)	4.386***(0.064)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315	0.463	0.319	0.463
N	41207	39548	41207	39548

注: $^{***}p<0.01$, $^{**}p<0.05$, $^{*}p<0.1$,括号中内容表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估计的有效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及政策动态效应分析*

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需要首先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因此,采用模型(2)检验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动态影响,其中选择将事前1期作为基期,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表3展示了在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两种情况下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影响效应的动态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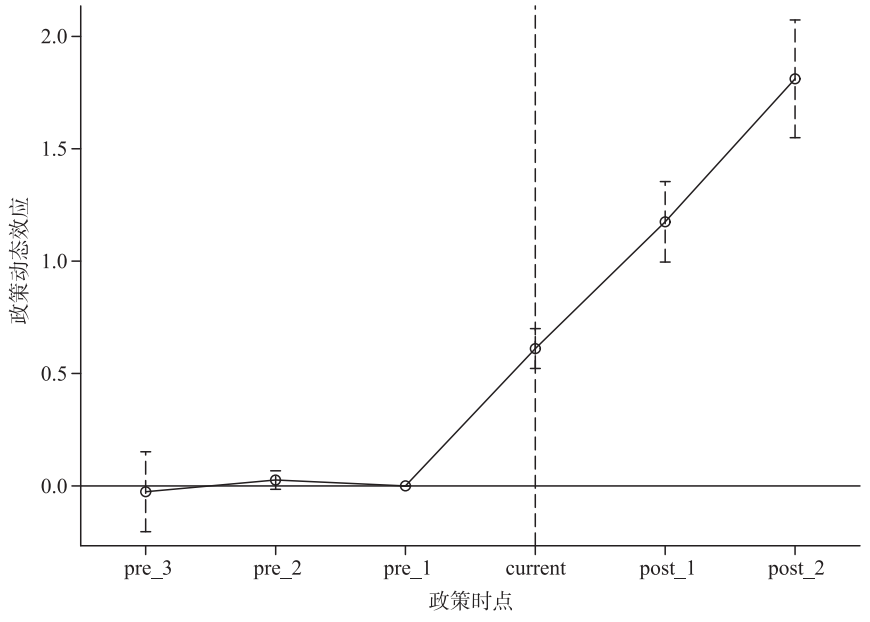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从图 1 结果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前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表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处理组相比控制组均显著上升，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效果明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促进作用持续提升。进一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动态效应（见表 3），可以看出，无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均对农民工返乡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在纳入控制变量后，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动而逐渐增强，各年份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其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程度也在逐渐增强。

表 3　动态效应回归结果

项目类	有控制变量			无控制变量		
年份	t = 2018	t = 2020	t = 2022	t = 2018	t = 2020	t = 2022
DID	0.790 ***（0.010）	1.313 ***（0.013）	1.503 ***（0.020）	0.108 ***（0.006）	0.403 ***（0.007）	0.211 ***（0.009）
常数项		6.641 ***（0.105）			0.360 ***（0.002）	
R^2		0.587			0.344	
N		39548			39548	

注： $^{***}p<0.01$，$^{**}p<0.05$，$^{*}p<0.1$。

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影响的回归结果是否由其他随机性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采用个体安慰剂检验方法展开进一步分析。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随机抽样 500 次并进行回归，从系数结果可以看出，其均值接近于 0 且小于基准回归系数；从 p 值结果来看，多数大于 0.1，表明在 10% 的水平上不显著，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不是由随机性因素所导致的，上述基准回归结果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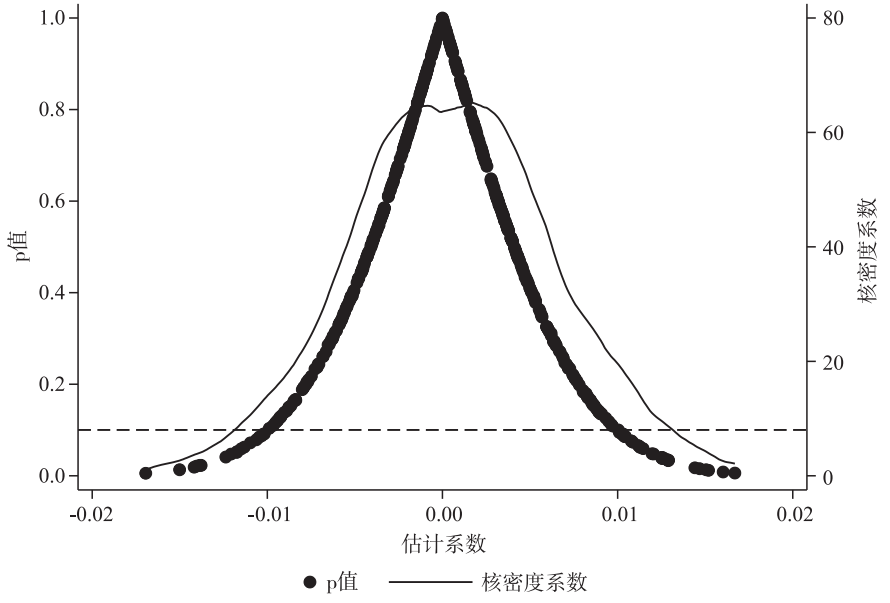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

3. 倾向得分匹配 - 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检验

考虑到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而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 双重差分模型(PSM - DID)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以本研究所用到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过程中所使用的协变量,并使用核密度匹配方法(窗宽0.05)、1∶1 近邻匹配方法、0.05 卡尺范围内 1∶1 近邻匹配方法依次进行匹配,匹配结果如表4所示。三种匹配方法的协变量的偏差均值在匹配后均小于10%,并从平均处理效应的均值T检验值结果来看(见表5),三种匹配方法在1%水平上均不能拒绝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即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匹配效果较好,表明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表4 样本整体 PSM - DID 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匹配状态	Pseudo R^2	LR chi2	偏差均值	中位数偏差	B 值	R 值
核密度匹配(窗宽0.05)	U	0.126	8168.46	19.1	10.8	76.3*	0.34*
	M	0.004	227.34	5.1	5.7	14.2	1.31
k 近邻匹配(k=1)	U	0.126	8168.46	19.1	10.8	76.3*	0.34*
	M	0.003	214.45	3.9	3.9	13.8	1.38
卡尺内 k 近邻匹配(k=1,卡尺=0.05)	U	0.126	8168.46	19.1	10.8	76.3*	0.34*
	M	0.003	214.45	4.5	3.9	13.8	1.38

注: $^{***}p<0.01$, $^{**}p<0.05$, $^{*}p<0.1$。

进一步从平均处理效应的系数结果来看(见表5),三种匹配方法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符号均为正。此外,在上述匹配的基础上,利用匹配后的样本,通过前文模型(1)重新估计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回归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三种匹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核密度匹配方法的回归结果与表1中的基准回归结果(0.759***)最为接近,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表 5　PSM—DID 的平均处理效应及回归结果

匹配方法		(1)列	(2)列	(3)列
		核密度匹配	k 近邻匹配(k=1)	卡尺内 k 近邻匹配(k=1,卡尺=0.05)
平均处理效应	系数	0.462***(0.006)	0.462***(0.008)	0.462***(0.008)
	T 检验值	17.67	17.67	17.67
回归结果	DID	0.759***(0.007)	0.878***(0.008)	0.878***(0.008)
	常数项	4.331***(0.064)	4.803***(0.138)	4.803***(0.1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2	0.649	0.654	0.654

注:$^{***}p<0.01$, $^{**}p<0.05$, $^{*}p<0.1$。

(三)稳健性检验

1.改变样本区间

由于 2020 年全国爆发了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剔除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2020 年数据后对样本数据重新进行估计。表 6 列(1)结果显示,即使在排除了 2020 年的观测值后,回归结果仍在 1% 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正向影响。

2.改变聚类层级

本文在上述基准回归分析过程中,选择聚类到个体层面的标准误,但考虑到同一地区内的农民工返乡行为可能存在共性,不同地区的农民工返乡行为可能存在差别,因此将标准误的聚类层级提高为个体、地区双重聚类,表 6 列(2)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振兴的回归系数为 0.759,与表 1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相同,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

3.考虑时间效应的影响

在上述基准回归分析中,没有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可能会存在遗漏变量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时间因素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借鉴申宇等[41]的做法,通过时间维度上的聚类标准误再次进行回归,以使结果更为稳健,结果如表 6 列(3)所示,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依然正向显著。

4.缩尾处理

为了排除数据中的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按照 1% 和 99% 的标准,对各变量进行缩尾处理。表 6 列(4)结果显示回归结果与表 1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接近,且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表 1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项目类	列(1)	列(2)	列(3)	列(4)
	改变样本区间	个体、地区双重聚类	时间维度聚类	缩尾处理
DID	0.739***(0.006)	0.759***(0.012)	0.759**(0.276)	0.758***(0.007)
常数项	4.095***(0.070)	4.386***(0.105)	4.386***(0.811)	4.382***(0.06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471	0.463	0.463	0.463
N	31643	39548	39548	39548

注:$^{***}p<0.01$, $^{**}p<0.05$, $^{*}p<0.1$。

(四)异质性分析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振兴战略显著促进了农民工返乡,为进一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影响农民工返乡的群体异质性,本部分将围绕农民工户籍所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务工距离、年龄这四个维度展开分析,以均值作为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作动态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由于四种维度下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影响的回归结果均显著,进一步使用Chow检验方法对组间系数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从表7结果可以看出,四种分析维度的组间系数差异均在1%水平上显著。

表7 动态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分类		列(1)		列(2)		列(3)		列(4)	
		户籍地所在省份处于高城镇化水平	户籍地所在省份处于低城镇化水平	高学历	低学历	长距离务工	短距离务工	高年龄组	低年龄组
DID	t=2018	0.809***	0.790***	0.931***	0.793***	0.787***	0.832***	0.837***	0.812***
		(0.016)	(0.013)	(0.016)	(0.010)	(0.028)	(0.009)	(0.011)	(0.060)
	t=2020	1.352***	1.317***	1.703***	1.272***	1.313***	1.413***	1.343***	1.392***
		(0.024)	(0.018)	(0.023)	(0.015)	(0.044)	(0.014)	(0.017)	(0.009)
	t=2022	1.584***	1.496***	2.127***	1.460***	1.739***	1.595***	1.589***	1.616***
		(0.034)	(0.027)	(0.036)	(0.021)	(0.061)	(0.020)	(0.022)	(0.014)
常数项		7.308***	6.471***	7.020***	6.882***	5.925***	7.368***	9.540***	5.181***
		(0.187)	(0.133)	(0.171)	(0.123)	(0.295)	(0.111)	(0.159)	(0.065)
组间系数差异性		-0.001* (0.000)		-0.011*** (0.007)		-0.061*** (0.005)		0.001*** (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574	0.592	0.714	0.573	0.590	0.582	0.597	0.597
N		13256	25519	5724	32169	31316	5401	17088	21161

注: $^{***}p<0.01$, $^{**}p<0.05$, $^{*}p<0.1$。

1. 地区异质性

各地区(设区市)城镇化水平可能会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拉动作用,为识别这一差异,本文依据2012—2022年各地区的城镇化率均值,并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基于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将样本划分为高城镇化水平组和低城镇化水平组,并进行回归。表7列(1)为户籍所在地区高城镇化水平组和低城镇化水平组,从结果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对户籍地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农民工返乡行为的拉动作用更大,且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效应随着政策执行时间的推进而提高,与表3中的动态政策效应变动一致。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通常拥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为农民工返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虽然乡村振兴战略对户籍地低城镇化水平地区的农民工影响效应也显著,但相比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这可能限制了乡村振兴战略对户籍地低城镇化水平地区农民工返乡的影响效应。

2. 受教育程度异质性

在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效应是否在不同受教育程度水平的农民工返乡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农民工样本中受教育程

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划分为低受教育程度组，反之则为高受教育程度组。回归结果见表 7 列（2），乡村振兴战略对高受教育程度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低受教育程度农民工，虽影响效应均随政策执行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提升，但二者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具体来看，高受教育程度农民工由于掌握相对更高的就业技能以及具备较好的适应能力，返乡后能够更好地利用政策资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相比之下，低受教育程度农民工返乡后面临的挑战会更多，如缺乏先进的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对就业稳定与否的担忧等，均会影响其返乡的决策。

3. 务工距离异质性

为探究乡村振兴战略对不同务工距离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根据务工地点将农民工样本划分为长距离务工和短距离务工两类，务工地点为户籍地所在市内县外和省内市外的为短距离务工，省外的则为长距离务工。回归结果如表 7 列（3）所示，乡村振兴战略对不同务工距离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且这一影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间的推进而增强，具体来看，在战略实施初期，对短距离务工农民工返乡的拉动作用更大，但在 2022 年，对长距离务工农民工返乡的拉动作用显著提升，明显超过了对短距离务工农民工的影响效应。可能是因为在战略实施初期，政策传递存在滞缓效应，再加上各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力度有所差异，对于长距离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其返乡就业需求仍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但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这一差距得到了改善，返乡农民工中长距离务工人员不断增加。

4. 年龄异质性

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有必要从年龄这一维度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影响效应的异质性。根据农民工样本中平均年龄 37 岁来划分高年龄组和低年龄组。回归结果如表 7 列（4）所示，乡村振兴战略对不同年龄组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且这一影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间的推进而增强。在战略实施初期，对高年龄组的影响效应大于低年龄组，但自 2020 年开始，乡村振兴战略对低年龄组农民工的影响效应显著提升，超过了对高年龄组的影响效应，二者的差距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动趋势。这种变动特征不仅反映了政策适应性和有效性随着时间推移而提升，也揭示了不同年龄段农民工对政策响应的时间差异。对于年长农民工而言，早期阶段可能更倾向于抓住政策提供的机会返回家乡，寻求更加稳定的就业创业机会；而对于年轻农民工来说，随着政策支持体系的不断完善，他们在考虑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家乡的发展潜力和生活质量。

（五）乡村振兴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机制分析

上述分析已得出并检验了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工返乡这一结论，本部分将进一步探究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民工返乡的作用机制，根据前文理论假设，乡村振兴战略可以通过强化农民工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和改善城乡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情况来促进农民工返乡。本文参考江艇[42]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验证，结果如表 8 所示。

1. 城乡信息互联互通效应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互联网使用时长的回归结果如表 8 列（1）（2）所示，其中列（1）为不加控制变量的结果，列（2）为加入了控制变量的结果，回归结果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时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作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43]，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1]，特别是互联网的知识溢出效应是促进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因素[3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为农民工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政策信息获取渠道，还加强了农村社会网络的紧密度。此外，互联网使得农村电商、数字农业等新兴业态在农村地区迅速崛起，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新的

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均对农民工返乡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可以通过改善城乡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情况促进农民工返乡。

2. 政府工作认可度

乡村振兴战略提升了农民工对乡村发展的信心、期望,进而增强了其返乡意愿。为此,表8列(3)(4)采用农民工对政府评价进行回归,以探讨乡村振兴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机制。列(3)为不加控制变量的结果,列(4)为加入了控制变量的结果,回归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乡村振兴对提高农民工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的相关帮扶举措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6],农民工对政府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与农民工对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有关,农民工对政府评价水平越高,说明他们对于政府在政策制定、执行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表现越满意,对家乡的工作机会、生活条件满意度和未来发展期望也相对有所提升,农民工则更愿意返乡。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度来促进农民工返乡。

表8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工返乡的作用机制检验

项目类	(1)	(2)	(3)	(4)
	城乡信息互联互通		政府评价	
DID	0.168***(0.014)	0.124***(0.018)	0.095***(0.129)	0.066***(0.017)
常数项	0.904***(0.007)	1.553***(0.185)	3.405***(0.006)	3.741***(0.163)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617	0.627	0.547	0.557
N	39548	39548	39548	39548

五、进一步分析

上述研究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群体异质性以及作用机制,这表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返乡农民工群体会发生较大变动,为了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支持工作,有必要探讨其返乡后的就业选择和工作地点选择问题。为了进一步探讨农民工返乡后生存状况,接下来进一步使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类型、工作地点选择方面存在的差异展开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一)农民工返乡后就业类型选择

使用全部返乡农民工样本进一步考察农民工返乡之后的就业分化情况,将返乡农民工划分为务农、受雇、创业三种类型,选择以受雇这一类型作为参照组,表9列(1)为返乡农民工就业分化的回归结果。

从个体层面来看,相比参照组(受雇),在年龄方面,返乡农民工的年龄越大,其选择务农的概率会越大,原因在于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其自身的就业技能、健康状况等存在一定的劣势,从事非农就业的竞争性不足;性别与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类型选择之间则没有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返乡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选择务农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而选择创业的可能性则显著提升;在婚姻方面,若返乡农民工已婚,其选择创业的概率会显著增加;健康状况与返乡农民工务农、创业的相关关系均显著,健康状况越好,其选择务农的概率会显著增加,而选择创业的概率会显著降低。

从家庭层面来看,相比参照组(受雇),家庭规模与返乡农民工选择务农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家庭规模越大,返乡农民工选择务农的概率会显著提升;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返乡农民工选择务农、创业的概率均会显著下降,尤其是选择务农的概率下降更为显著;家庭人均净资产与返乡农民工选择创业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人均净资产水平越高,返乡农民工选择创业的概率会更大。

(二)农民工返乡后工作地点选择

根据返乡农民工工作地点的选择,将返乡农民工样本划分为当前居住村/居、当前居住乡/镇/街道的其他村/居、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三种类型,以当前居住村/居为参照组,表 9 列(2)为返乡农民工工作地点选择差异的回归结果。

从个体层面来看,相比参照组(在当前居住村/居工作),年龄与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乡/镇/街道的其他村/居、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工作的概率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工作的概率下降程度更为显著;性别、受教育程度均与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工作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男性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工作的概率更高,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在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工作的概率更高;健康状况则与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工作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健康状况越好,选择在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工作的可能性越小。

从家庭层面来看,家庭规模与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乡/镇/街道的其他村/居、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工作的概率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规模越大,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工作的概率增加程度更为显著。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工作的概率增加程度更为显著。家庭人均净资产与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乡/镇/街道的其他村/居工作的概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家庭人均净资产越高,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乡/镇/街道的其他村/居工作的概率会显著降低。

表 9　返乡农民工就业类型选择差异、工作地点选择差异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就业类型选择		工作地点选择	
	务农	创业	当前居住在乡/镇/街道的其他村/居	当前居住在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
年龄	0.017**(0.009)	-0.001(0.004)	-0.006*(0.004)	-0.012***(0.004)
性别	0.012(0.120)	0.025(0.055)	-0.039(0.055)	0.201***(0.520)
受教育程度	-0.694***(0.110)	0.202***(0.034)	0.044(0.033)	0.209***(0.029)
婚姻状况	-0.009(0.208)	0.690***(0.094)	0.445***(0.085)	-0.046(0.073)
健康状况	0.111**(0.052)	-0.060**(0.025)	-0.023(0.025)	-0.056**(0.024)
家庭规模	0.073**(0.032)	0.021(0.015)	0.028*(0.016)	0.080***(0.015)
家庭人均收入	-0.268***(0.061)	-0.091**(0.036)	0.067*(0.036)	0.196***(0.035)
家庭人均净资产	0.001(0.011)	0.029***(0.006)	-0.010*(0.006)	-0.007(0.005)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214(1.036)	-1.353**(0.556)	-1.683***(0.508)	-2.574***(0.470)
Prob > chi2	0.000		0.000	
Pseudo R^2	0.056		0.041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0—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以乡村振兴战略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这一促进作用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2)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农民工户籍所在地城镇化水平、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务工距离远近、年龄的差异会使得农民工返乡行为受到不同的影响,其中,对户籍地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受教育程度水平较高的农民工返乡的拉动作用更大,但随时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对长距离务工者返乡的拉动作用逐渐超过了对短距离务工者,对低年龄农民工返乡的影响效应逐渐超过了高年龄农民工;(3)乡村振兴战略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度和改善城乡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情况来促进农民工返乡;(4)进一步分析发现,返乡农民工就业类型选择和工作地点选择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选择从事务农、受雇或创业等不同就业类型的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当前居住村/居工作、当前居住乡/镇/街道的其他村/居、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不同工作地点的返乡农民工,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净资产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二)建议

为充分发挥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促进作用和进一步服务好返乡农民工,推动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一是完善城乡交通网络,提高省-市-县-乡-村之间的交通便利水平,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合理流动;二是提高通信网络覆盖率和稳定性,加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农村基础设施中的应用,推进信息化建设,促进城乡信息互动;三是合理规划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布局,提高基础设施资源利用效率。第二,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效能,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工返乡的动态影响的群体异质性,科学预测未来返乡农民工规模、群体特征、就业选择和返乡地选择,针对不同返乡农民工群体精准分类施策。一是推进地方政府互联网平台建设,提高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为农民工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获取平台,增进农民工对家乡发展和扶持政策的了解程度;二是鼓励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创新,不断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和方法,重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三是加强对低受教育程度、低就业能力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创业指导、资金扶持等服务。第三,以县域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一是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推动县域范围内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二是以县城为载体,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引导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延伸,畅通乡村与县城之间的要素双向流动、普惠共享机制。

参考文献:

[1]蔡昉.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4-23.

[2]梁栋,吴存玉. 论乡村振兴的精准推进——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构建[J]. 青海社会科学,2019(2):122-128.

[3]吴瑞君,薛琪薪. 中国人口迁移变化背景下农民工回流返乡就业研究[J]. 学术界,2020(5):135-144.

[4]王志涛,李晗冰. 身份认同、个人技能与农民工返乡意愿——基于 CMD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经纬,2021(3):34 - 43.
[5]国家统计局. 2023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24 - 04 - 30)[2024 - 12 - 06]. https://www. stats. gov. cn/sj/zxfb/202404/t20240430_1948783. html.
[6]陈锡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5 - 12.
[7]王兴国,吴梵. 科技创新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及实践路径[J]. 广东社会科学,2024(2):54 - 61.
[8]文丰安.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与治理[J]. 农村经济,2021(5):1 - 10.
[9]何阳,杨年锦,李成明. 农村电子商务、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 农村金融研究,2024(8):56 - 68.
[10]张红宇. 中国农村改革的未来方向[J]. 农业经济问题,2020(2):107 - 114.
[11]任远,施闻.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J]. 人口研究,2017(2):71 - 83.
[12]王尚君. 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探析[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8(1):10 - 12.
[13]朱平国,卢勋,张新民,等. 居有其所:美丽乡村建设[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25 - 28.
[14]AYELE LINGER,DEGEFA TEREFE. Temporary rural-rural labor migration from QuaritDistrict, Northwest Ethiopia: a search for the determinants[J]. African geographical review, 2020(4):379 - 397.
[15]罗兴奇. 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及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 N 村的实证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2016(7):93 - 101.
[16]石丹淅,王轶.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影响因素及其政策促进[J]. 求是学刊,2021(1):90 - 101.
[17]贺小丹,董敏凯,周亚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回流与农村资源配置——基于农民工返乡后行为的微观分析[J]. 财经研究,2021(2):19 - 33.
[18]张立新,段慧昱,戚晓妮. 创业环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9(1):72 - 83.
[19]罗卫怡. 地方感对返乡农民工留乡就业意愿的影响[J]. 安徽农业科学,2021(11):261 - 265.
[20]曹宗平,曾志彪. 返乡农民工群体在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基于内在机理与政策取向视角[J]. 开放导报,2024(5):94 - 104.
[21]王邹,孙久文. 以高质量的县城建设推进县域现代化:事实与路径[J]. 中国农村观察,2023(6):2 - 23.
[22]贾鹏,庄晋财,李娟. 农村公共品供给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了吗? ——基于 CLD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6):12 - 25.
[23]谢勇,周润希.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17(2):92 - 101.
[24]李敏,阎晓博,黄晓慧.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90 - 98.
[25]胡枫,史宇鹏. 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J]. 人口学刊,2013(2):71 - 80.
[26]马芒,徐欣欣,林学翔.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2012(2):95 - 102.
[27]DEMURGER, XU H. Return migrants:The rise of new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1(10):1847 - 1861.
[28]周伟.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J]. 农业经济,2020(3):81 - 83.
[29]葛永波,陈琦. 农民工回流、家庭收入与储蓄率提高[J]. 经济问题,2020(4):42 - 49.
[30]夏杰长,王鹏飞,贺俊.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在积极性何以被激发:一个案例研究[J]. 东岳论丛,2024(1):49 - 56.
[31]卢素兰,冯艳维,钟海霞,等. 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机制与实证研究[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78 - 86.
[32]张思阳,赵敏娟,应新安,等.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互联网嵌入视角[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5):783 - 792.
[33]安晓明. 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战略取向、实践问题与应对[J]. 西部论坛,2020(6):38 - 47.

[34]王一安,吴玲. 数字乡村赋能农民主体性提升的突破路径[J]. 现代农业研究,2024(5):33-36.
[35]毛春合,宋昊阳.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的优化路径研究[J]. 延边大学农学学报,2023(2):103-109.
[36]王爱华,张珍. 农民工"回流式"城镇化: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J]. 当代经济研究,2019(12):60-67.
[37]黄炜,张子尧,刘安然. 从双重差分法到事件研究法[J]. 产业经济评论,2022(2):17-36.
[38]张在一,毛学峰. 对外出农民工统计方式的重新思考[J]. 中国人口科学,2023(3):115-128.
[39]张广胜,王若男.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J]. 中国农村经济,2023(1):58-76.
[40]刘新民,张衡,于文成. 务工城市双创环境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22(11):4-19.
[41]申宇,任美旭,赵静梅.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J]. 中国工业经济,2020(4):154-173.
[42]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43]袁方,史清华. 从返乡到创业——互联网接入对农民工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J]. 南方经济,2019(10):61-77.

The Impa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YANG Sheng-li, WANG Wei-rong, LIU Jin-pan
(*School of Economic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701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ies, the population flow is undergoing changes. Tak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based on the seven waves of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from 2010-2022, apply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and the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o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is effect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over time. (2)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ose with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provinces with higher urbanization levels and those with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s more significant at each stag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short-distance migrant workers and those in the older age group. A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progresses, the promoting effect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for long-distance migrant workers and those in the younger age group. (3) In terms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promote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by enhancing their recognition of government work and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4)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phenomena in the employment type and work location choices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improve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focus on county-level integratio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turn and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eturning to start a business

【责任编辑:杜晓艺】